

编者按 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具体而言,批评认知语言学探究与语言使用(usages)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legitimizing functions)。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认知语言学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理论如概念隐喻、转喻、概念整合和认知语法等,学者们运用这些理论关注语言使用唤起的概念结构如何反映意识形态或使自己的观点合法化,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研究前景。在此发表由张辉教授组稿四篇,以飨读者。

战略情报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 ——认知语法的视角

张辉 罗一丽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本文运用认知语法的主要概念和理论框架对战略情报话语进行批评认知分析,是运用认知语法对这一语类进行批评认知分析的首次尝试。本文主要运用认知语法中的行为链分析情报话语的小句组织方式以及使用情境植入分析情报话语中情报分析者/写作者对所描述事情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判断,并认为通过话语分析得出的信息具有一定情报价值。本文最后指出,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可以成为情报分析方法中有效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 认知语法 批评认知语言学 战略情报 话语分析 行为链 情境植入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7)06-0004-07

DOI:10.13978/j.cnki.wyyj.2017.06.002

0. 引言

战略情报是情报分析者对某一国家的某一问题所进行的综合、详细的分析,常常作为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认识世界和决策未来的重要参考。战略情报报告主要由语言作为媒介,把分析好的信息(即情报)传递给决策者,因此解构语言便是了解战略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中美军事记分卡》(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Heginbotham 2015)为例,运用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Langacker 1991, 2008)的相关理论,分析情报话语的小句组织方式(行为链的偏好)和情境植入系统(grounding system)。

1. 相关文献综述

运用认知语法提出的理论分析情报话语的文献目前还不多见,但有的学者已经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以及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对战略情报话语进行研究(Zhang & Di 2016)。他们把隐喻理论、概念整合与

话语空间理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战略情报话语中的语言策略与认知偏见,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和评估战略情报分析报告,揭示美国战略思想中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评估美国的战略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运用认知语法进行话语分析的主要是媒体话语和文学作品。Hart(2014)描述了作为语言模式的语法在揭示社会和政治语境下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所起的作用。作者通过功能语法、多模态语法和认知语法,提出了一种分析话语中语法选择的意识形态效应模式,并对多模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估。

有些学者运用认知语法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 Stockwell 2009, Harrison et al. 2014, Harrison 2017)。Stockwell(2009)在其著作第六章明确提出以认知语法为基础分析文学作品的观点,并把认知识解(construals)作为文学作品中创造意义的方式。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取决于我们以多近的距离考察它(抽象性)、我们选择看什么(聚焦)、我们最注意什么成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编号:14AYY009)的阶段性成果。

(突显)以及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视角)。他把这些认知知识解用于诗歌分析,揭示了诗歌中意义的侧重(profiling)以及行为链(action chain)的方式和规律。

Harrison et al.(2014)是2013年在诺丁汉大学召开研讨会的论文集,该研讨会的宗旨就是在认知语法的框架下探讨文学阅读。作者们将这一论文集视为认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并指出这一研究如果放置于认知语法的框架下可以对文学研究中的虚拟模拟(fictive simulation)、气氛(ambience)、视角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与重新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以及责任与归属等问题进行非常详细的分析。

Cognitive Grammar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是 Harrison(2017)第一本专门运用认知语法分析当代小说的专著。他运用认知语法中的行为链(action chain)、参照点模式(reference point model)、侧重(profiling)以及组合路径(compositional path)分析了美国现代小说。这说明认知语法的概念具有可拓展性(scalability),即认知语法中的概念可以发展成有效的文学语言话语分析框架。认知语言学概念,具体地讲应为认知语法概念,一般分析的都是小句层面,但可以拓展成为话语分析的认知语言学模式或理论。

2. 认知语法的基本概念

2.1 认知解

认知语法是一种语法模式,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具身的(embodied)。具身性指的是我们使用与理解语言的方式,是由我们身体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经验所塑造的。认知语法所思考的是读者与说话人如何与我们使用和加工的语言相互作用的。Langacker(1987)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象征的(symbolic)和意象的(imagistic),就语言产出与理解而言,认知塑造了语言,语言的所有单位都是有意义的,并由意义与形式的配对(即构式)所构成。语言是一个巨大的清单库,构成单位就是构式。构式由两个独立的单位构成,即形式与常规意义,分别形成了两极,形式与形式结构构成了音位极(phonological pole),而意义与功能结构构成语义极,语义极与音位极之间的象征对应关系形成了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s)。

整个认知语法的运作都建立在以下理论概念基础上,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 Langacker(2008)、Harrison(2017: 13-23),本文限于篇幅只做简要的介绍。如前所述,认知语法认为认知塑造语言。而这里所说的认知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即识解(construals)。识解是认知语法中最根本的概念之一,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识解运作的结果。认知语法中的

射体(trajector)与界标(landmark)是一个基本的区别性概念,反映了人不同的注意力。射体是场境吸引注意力的实体(通常是移动的物体)相对背景而言,更加突显,而背景则是界标。在一个小句中,射体是读者注意力所指向的地方。

[1] The penguin (tr) is on the iceberg(lm).

[2] The iceberg(tr) moves under the penguin(lm).

在例[1]中“the penguin”是主要的注意力焦点,而“the iceberg”则是次要的。在例[2]中,“iceberg”是主要的注意力焦点而“the penguin”是次要的。在每个小句中都会构成射体-界标的连接关系。

另一个主要的识解操作是意象图式(Image-schema)。意象图式是从日常射体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活动的系统化模式(schematized pattern)。意象图式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是对情境进行概念化的模板,句子的基本结构来自于意象图式。识解还包括人的抽象、聚焦、突显和视角的能力。所谓抽象能力是指人可以以不同的抽象度谈论事物,有些描写可以非常详细,而有些则很概括。聚焦(focusing)是指对概念内容的不同选择,包括图形与背景、新信息与旧信息。突显指的是词语的概念内容中所侧重的内容,即人们注意力所聚焦的内容。视角是连接观察者与场境的观察角度,视角与场境的描述者有关。

2.2 情境植入

在认知语法中还有一些概念对话语分析非常重要,如情境植入(grounding)、行为链(action chains)、参照点和扫描(scanning)。情境植入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作者和读者)处于某一观察安排之内的过程。Langacker(2008: 259-309)指出,术语情境(ground)指的是言语事件、其参与者(说话人和听话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当时的情况,包括说话的时间和地点等。情境植入可以是隐含的也可以是明确的。语言中有一些情境植入成分(grounding elements),通过这些成分说话人引导听话人注意某些话语指称物,如英语中的“this”“that”“some”“a”“each”“every”和“any”等。情境植入分为名词性情境植入(nominal grounding)和小句情境植入(clausal grounding)(Langacker 2008: 259)。情境植入不是一个语法范畴,而是一个语义功能,它是词语作为名词性短语或小句的概念组织的一个方面。名词性情境植入成分包括冠词、指示词与数量词等,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使名词性短语与某一语境相关联。一个光杆名词如“rose”是一个非情境植入的词,因为它与语境没有关联。如果我们说“this rose”这个短语一定在某一语境指某一朵玫瑰花,

这就是名词性情境植入。名词性情境植入意味着我们已经可以指称 参与者(说话人与听话人)把其注意力引导到同一想象的实体。名词性情境植入有两种主要策略:一种是描写策略,描写既可以抽象又可以详细(抽象度),第二种是指示策略(deictic strategies),从众多候选人中挑出所指物,如代词和指示词等可以执行这一策略。

小句情境植入是将一个小句植入某一语境中,使小句与语境产生关联。对于我们所描写的每一个情境,需要我们在小句中标明其认知地位。情境与说话人对事实的概念是情境植入的成分所表达认识判断的基本参照点。由于我们努力进行“认识控制”(epistemic control),我们每个人都会形成现实的概念。我们想象的现实是通过小句情境植入成分所表达的。想象的现实(conceived reality)是说话人当前已经接受的知识,小句情境植入表明想象的现实概念的认知地位。由于每种语言描写发生的小句和标记认识地位方式不同,它们都有自己的小句情境植入系统,例如时体和情态动词等。

认知语法中的行为链是小句表达的基本结构。小句结构根植于基本的人类经验。Langacker(2008: 355-357)认为小句的结构由几个人类经验中原型或典型(archetype)作为其认知基础。首先,把一个场景组织架构分为整体环境(global setting)和一些更小的参与者(participants),参与者通常是人和物,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另一个典型是桌球模式(billiard-ball model),物体在空间中移动,通过力的物理接触相互影响,有些物体发出能量,有些传递和吸收能量。基于桌球模式,我们就有行为链这一典型人类经验。一个行为链是一系列的力的相互作用,每一个行为链都包括从一个到另一个参与者的能量传递。最小的行为链包含了两个参与者相互作用以及能量的传递。

2.3 典型角色

另一个与行为和事件相关的是典型角色(archetypal roles)。施事(agent)、受事(patient)、工具和经历者(experiencer)等都是行为与事件中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另一个重要的典型经验是舞台模式(stage model)。舞台模式意味着,看戏时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一成分(如某一演员和情节)而同时忽略另一些成分。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语言表达,我们的注意力分别对应于词语的侧重(profile)。在行为链中,被语言所编码的行为或事件的一部分是我们注意力集中之处,即被侧重的,而没有编码的则作为事件的背景存在。最后是言语事件本身,包括说、听、社会交际、言语

行为和默认的观察安排(default viewing arrangement)。这些人类典型经验共同构成了小句结构的标准事件模式(Canonical Event Model),因为这一模式表征了我们表达和理解典型经验发生的标准方式。整个发生是一个有界的力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施事作用于受事引起状态的变化。我们可以使用标准事件模式作为参照,研究话语分析及物性表达的情况,以解释语篇和话语的构成和使用情况(Harrison 2017:19)。

本文主要运用认知语法中事件的典型角色和情境植入等概念分析情报话语的语言文体特色以及这一文体特色所蕴含的情报价值,进一步论证语言学的方法,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可以为情报分析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本文以2015年由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中美军事记分卡》(Heginbotham 2015)为语料。该书共有389页,总30万字。《中美军事记分卡》对中国与美国在空军、海军、核战争和空间网络战等方面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比较,以台湾海峡和南海群岛作为两个作战场景分析并预测了中美在以上方面的军事实力、战略和战术。该书是最近几年出版的情报报告中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代表作。

3. 情报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

认知语法的概念如行为链、情境植入和参照点等大部分一般用于词汇、短语和小句层面的分析。Hart(2014)、Harrison(2017)和Harrison et.al(2014)等人的研究表明,认知语言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批评话语分析的框架,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工具箱”中有用的工具之一。本文的分析也尝试将认知语法的理论和相关概念拓展到批评话语分析之中。

3.1 行为链的分析

Langacker 提出行为链等概念来分析小句的基本结构。小句的结构是桌球模式,基于能量的转换从施事到受事的过程,以此形成的一个标准事件模式。Langacker(2008: 366)认为,影响标准事件连接的主要因素是射体的选择。语言中有两种策略,要么把射体与施事连接在一起,要么把射体与主题(theme)相连接。前者是施事取向(agent orientation),而后者是主题取向。施事取向反映了我们的角色为有意识的动物,有力地作用于这个世界,消耗能量以便成功地获得和维持对周围环境的控制。主题取向反映了这一事实:我们在以某种方式规划好的世界中运作,在这个世界中实体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占有不同的地点,这些实体对我们影响的敏感性和可及性各有不同。

施事和主题取向属于不同的编码策略,目的是把突显的信息编码转变为小句中具有认知突显的典

型参与者角色。施事取向是把施事选择为射体的编码策略,典型的小句是侧重标准事件模式,即施事为射体,主题(如受事)为界标,如英语是施事取向的语言(Langacker 2008: 374)。主题取向是选择主题为射体,典型的小句是单一参与者的主题过程(thematic process)。在这一小句中,焦点突显主题。

在我们所分析的语料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作者试图对比中美军事的总体实力,主要采取施事取向的编码策略。

[3] As late as the mid-1990s, China's military was large but antiquated in both equipment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 Since then, it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virtually all areas. It has replaced much of its old stock of equipment, updated its doctrine,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its personnel, and increased the realism of its training. New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challenge the 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operate in areas close to China.

...Defense spending, which grew by 620 percent in real terms over the same period (for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11 percent), has outstripped growth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 United States enjoys a stockpile of equipment that is, overall, more formidable than China's. China is only readying it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en full-sized carriers and nine amphibious assault ship capable of supporting fixed-wing aircraft.

在例[3]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为链的主要类型是施事取向。当作者描写中国军力的发展和提高时,作者把“China”“China's military”“(China's) defense spending”等施事作射体,而把其他的主题如“the ability of the US”作为界标。作者把施事如“China”等赋予于焦点突显,而把其他主题置于背景的认知状态。

而当作者讨论美国的军事实力时,作者也采取施事取向的编码策略,区别是他把“the United States”“the Air Force”和“Marine Corps”等施事作为射体,将其置于焦点突显的认知状态,而把其他主题作为界标。

在《中美军事记分卡》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施事取向不断地相互转换,构成了整个篇章的文体特征和模式。在本书的第二章,“Different Paths: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Development, 1996-2017.”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施事取向编码策略的转换使用,构成了整个叙事的特征。

表 1 《中美军事记分卡》第二章中行为链的施事取向

中国军力发展(第一部分)美国军力发展(第二部分)			
中国 * ^① 作为射体		美国 * ^② 作为射体	
(China as trajector)	(U.S. as trajector)	(China as trajector)	(US as trajector)
77(158)	4(158) ^③	6(129)	56(129)
62%	2.6%	5.4%	67%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军力发展第一部分,把中国相关的概念作为施事—主题相作用(agent-theme interaction)中,射体的小句非常多,占了所有小句数量的 62%,而与美国相关的概念作为射体只占了 2.6%。这说明与中国相关的概念大多处于焦点突显的认知地位。

在美国军力发展的第二部分中,施事取向的小句中的射体大部分是与美国相关的概念,而与中国相关的概念作为界标几乎没有出现。这说明,焦点突显大部分落在美国,作者主要论述美国的军力发展,几乎没有与中国军力发展做比较。这种小句的铺排模式基本上反映了情报话语比较典型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中美两国的军力。

3.2 情境植入的分析

名词性情境植入表明,我们获得了在语境中指

称的功能,意味着话语参与者把其注意力引导到同一想象的实体之上。在语言中,我们有各种策略可以获得名词性指称,其中最简便和明显的策略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常规标签,如一个专有名词。在情报话语之中,情报分析者/写作者会使用众多的专有名词,通常我们在一般政治语篇之中很难看到。在《中美军事记分卡》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专业军事术语,其中大多数是专有名词,指各种导弹和航船等,例如 J-5, J-6, Su-27, Su30, HQ-2, SAM S-300, HQ-12 SAM, SEAD, F-16CJ 等。

但在军事情报话语中,名词性情境植入的策略大多是描写策略(descriptive strategies)和指示策略(deictic strategies)。描写策略是指情报话语的写作者通过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提供的资源创建各种粗细程度不同的词语表达指称语篇中的想象的实体。在《中美军事记分卡》中,大多数的名词性情境

植入采取的是描写性策略和指称策略相结合的方式。例如：

[4] Both the Chinese ground-based skywave OTH radar and space-based NOSS provide China with highly capable broad -areas surveillance systems that can detect and locate U.S. warships with some accuracy far from the Chinese coastline. China could engage U.S. CSGs using data supplied exclusively by these assets, or it could use data from them to cue its space-based imaging assets to identify and more accurately locate CSG elements, such as the aircraft carrier, before engaging.

[5] Although Chinese satellite imaging capabilities are becoming more robust, large maritime search areas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for PLA commanders to locate targets using these satellites alone. However, with cueing from OTH radars and NOSS about the general location of US assets, Chinese imaging satellites could obtain more precise 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location data with some degree of regularity and reliability.

从上面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名词性情境植入采取了描写性策略和专有名词相结合的方式,例如“the Chinese ground-based skywave OTH radar”“space-based NOSS”“highly capable broad-areas surveillance system”和“Chinese satellite imaging capabilities”等,有时也会使用粗框架的名词性情境植入代替精确的指称词语,例如在上例中,作者使用“China”指称“China Army Air Force”,使用“Chinese imaging satellites”而不使用具体型号的某种卫星等。在这种语类中,会出现大量的缩略语,这是军事英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例如“NOSS”(Navy Ocean Surveillance Satellite),“OTH” radar (Over the horizon, 超视距雷达),CSG (航母攻击群)等。这些缩略语的使用大大节省了写作空间,可以准确描述所指称的武器、军舰和通讯系统等,但对于外行而言会造成理解困难。

小句情境植入主要是通过小句情境植入系统动作的。小句植入是指限定性的小句侧重了某一过程。小句情境植入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确信知道的事情与我们语言上表达的和思考的事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对于我们描写的每一个情境,我们需要表明描写所具有的认识地位(epistemic status)。由于我们试图进行“认识上的掌握”(epistemic control),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定义为所发生情况的整个历史,因而在语篇中,交际双方将自身对现实的认识加入推进,彼此协商并做出

调整,与情境说话者对现实的认识结合,一起充当了入场成分所表达的认识判断的基本参照点(Langacker 2008)。在英语中,小句的情境植入系统包括时态—情态系统和言据系统(evidential system)。

情境植入包括真实的(real)和投射的(projected),真实的情境植入系统包括接近(immediate)和不接近(non-immediate),就时态而言,表示真实发生的事件,在每种情况下,零位成员均表明某种认识上的接近性,与构想的现实是一致的,显性标记则表明更大的认识距离。现在时为零形式,过去式则是显性标记。就情态而言,零位成员是没有情态动词的,如“may”“can”“will”和“must”的情况。没有情态动词表明写作者将所侧重的过程(profiled process)看作为真实的,是构想现实的一部分。情态将其置于构想现实之外,一个我们称为“非现实”的区域,与构想现实呈互补关系。由情态动词进行的情境植入不是真实的,而是投射现实,表明说话人对投射现实的认识和掌握,判断投射现实发生的可能性。

在情报话语之中,当写作者或情报分析者认为其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他就会使用真实的情境植入策略。例如：

[6] Even with a doubling in the size of China’s strategic nuclear inventory and a de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U.S. nuclear arsenal, Beijing nevertheless still lacked the ability to conduct a disarming nuclear first strike in 2003.

[7] Question about IOC date of certain system in Chinese case and accounting rules under New START complicate the task of accessing the nuclear balance in 2017.

从时态看,例[7]是概念层,是接近(immediacy)基线的认识地位,而例[6]是不接近的,表示的是回忆(recall),征用了额外的概念资源,例[6]中的过去时把侧重的事件转换为非接近的现实(non-immediate reality),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回忆和描述。

就情态而言,基本的模式如 may, can, will 和 shall 等表明其认识地位为投射的现实而非真实的现实。情态的概念上更远的与更详细的模式如 might, could, would 和 should 唤起了情态上投射的想象基础,产生了非接近投射更抽象的认识地位,其概念层级就越偏离接近的认识地位(越往右其表示概念可能性就越小),如图 1 所示。

例如：

[8] Cyber attacks may achieve more permanent effects if the targets are similar in nature to industrial controllers—that is, computers or other devices that c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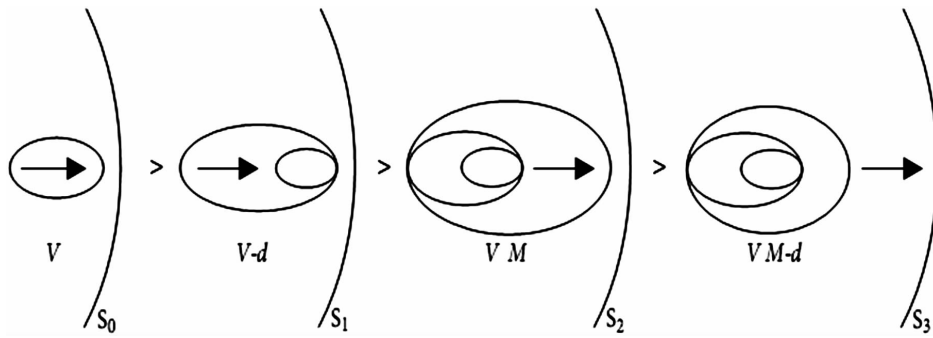


图 1 英语情境植入系统的概念层级(Langacker 2017: 28)

be reprogrammed in situ and that can command equipment to carry out self-destructive operations.

[9] Obvious targets for U. S. cyber operators would be the Chinese IADS and maritime ISR systems.

[10] China's strategists may also contemplate the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a strategic cyber attack may raise rather than lowe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ersist in its defense of Taiwan.

[11]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sagreement over whether the Chinese would try to use cyber attacks to erode the will of the U.S. public to wage war over Taiwan.

[12]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part, would seek to gain air superiority through both air-to-air battles and by penetrating Chinese airspace to strike air defense targets... Air and missile strikes might also be undertaken on radar installati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 sites.

从以上的例句可以看出,情报写作者/分析者运用语法化的情境植入成分评估所侧重过程发生的可能性。句中的“may”表示的是接近的投射(immediate projection),而“would”和“might”则引起了情态投射的想象基础,产生了更加抽象的非接近投射的认识地位,表示所侧重的过程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从情报话语的情态动词的使用情报,我们评估情报写作者对所描述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情报,从中了解他们对事件发生的把握度。

3.3 言据系统

情报话语中体现情报报告分析者对所描写事件把握度的另一指标是语言的言据系统(evidential system)。言据性(evidentiality)以说话人/写作者为主,判断话语信息的来源及其可靠性。表征从中心不断增加距离的来源是内在的经历、感知、基于高层认知的推理和报道(来自其他人或机构的报道等)。言据系统很少区分感知和内在经历之间的差异。就概念距离而言,推理和报道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Langacker

(2017)指出,在有些语言中如完卡盖丘亚语(Wanka Quechua),其三种不同的言据由不同的词素表示,例如直接的信息用“-mi”表示这一信息来自或基于自身的经历,推理的信息用“-chra”表示该信息来自或基于其他的证据,报道的信息用“-shi”表示来自或基于其他的信息来源。在英语中,我们没有专门的词素表示言据系统,但英语有词汇和委婉手段(lexical and periphrastic means)反映言据系统。总之,言据系统的成分是以层级形式组织的,反映了不同的概念复杂性程度。

Langacker(2008)把情境植入的成分局限在一组语法化的成分之中,包括名词性和小句情境植入,详细指明所侧重事物和过程的认识地位。Langacker(2017)指出服务于这一语义功能的不仅是这些语法化的成分,还包括表示言据的词汇和委婉的手段。这些词汇与委婉手段关注的是信息的来源或者是认识上确定的程度,应该说是认识上控制的两个层面。例如:

[13] Questions about IOC data of certain system in the Chinese case and accounting rules under New START complicate the task of assessing the nuclear balance in 2017. We anticipate that the number of deployed U.S. warheads will decline from 4806 (our 2010 estimate) to 2144 in 2017.

[14] For several years, U.S. military publications have suggested that China is working on MIRVing ICBMs (脚注:For example, the 2014 DoD report on Chinese military power states, “China is working on a range of technologies to attempt to counter U.S. and other countries'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s—including MIRVs, decoys, chaff, jamming and thermal shielding”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June 2014. p30))

[15] Beyond 2017 *it seems likely* that China may MIRV its road-mobile DF-41,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development and which would yield more in terms of retaliatory credibility (脚注 :Given that existing mobile missiles (including the DF-31, DF-31A and JL-2)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would require miniaturizing warheads, they are unlikely candidates... 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 "DF-41(CSSX-10)" January 6, 2015)

例中,信息来源大部分使用脚注的形式标注,并没有在句子中加入表示信息来源的委婉性词语如“*They said*”等。使用脚注标注出句子的信息来源比使用委婉性词语如“*I hear*”“*we infer*”和“*they report*”等能够更加详细和清楚说明信息的出处和来源,增强所描写事件的可靠性,情报分析者可以确定和提高他对所描写事件的把握度。

就委婉性词语表达而言,整个《中美军事记分卡》的报告中出现委婉性词语表达的次数不多,因为大多数的信息出处和来源基本上使用脚注。但也出现了一些委婉的表达,如例[13]和[15]。在例[13]中,“*We anticipate*”主要是关于所描写事件的认识确定度,说明了“*we*”在认识上的立场,是这事件发生的基础。在例[15]中,“*It seems likely...*”也表明情报分析者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说明所描述的事件不是真实的,而是投射的或想象的。在话语中出现不同的情态动词或与此类似的“*it seems likely...*”两者有时结合在一起说明所描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情报分析者(或写作者)对所描写事件的主观判断。

总之,句子中出现的情境植入成分不管是语法化的形式、词汇手段或委婉性的词语表达手段等都是明确地表明信息的可靠性和来源,实施语义功能。这一基本的语义功能便是名词性和小句情境植入,表示侧重事物和过程在认识上的地位。情境植入不仅包括小句内部成分一套语法化的系统,如情态动词等,而且还包括词汇和委婉性词语表达手段。言据性表达也是情境植入成分。言据表达与时态—情态常常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认识控制和主体间的联系。

4. 结论

以上对情报话语的分析表明,使用以施事为导向的构式或以主题为导向的构式反映出情报分析者下意识地组织话语的方式,这一组织话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情报分析者的偏好和倾向性。另

外,情境植入展示出语言与认知内在的自我中心。以中心以及从中心延伸的组织形式是语言和概念结构的根本性质。中心就说话人/写作者而言,在这里是情报分析者,与此同时,情境包括交际双方、言语事件与其在时间、空间和现实中的位置。从话语的时态—情态情境植入系统者,情报话语的写作者利用这一系统区分时间上接近与非接近(偏远的)以及真实与投射的现实。他们还利用言据系统区分直接的与非直接的知识,后者包括推理(高层认知的思考)和报道(来自其他人的信息)。本文旨在强调,不管小句的组织方式呈情境植入系统,还是这些评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如何加以分析和探究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至关重要。因此,认知语言学(如本文中的认知语法)可以成为众多情报分析工具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参与文献:

- Harrison, C. 2017. *Cognitive Grammar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arrison, C., L. Nuttal, P. Stockwell & Yuan Wenjuan. 2014. *Cognitive Grammar in Literature*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art, C. 2014.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M]. London: Bloomsburg.
- Heginbotham, E. 2015.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M]. Washington: Rand Corporation.
- Langacker, R. C. 1987.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C. 1991.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C. 2001.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2): 143-88.
- Langacker, R. C.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17. Evidentiality in cognitive grammar [C] // Marin, I. J. et al. *Evidentiality Revisit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tockwell, P. 2009.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Hui & Di Weichao. 2016. Making intelligence more transparent: a critical cognitive analysis of U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Sino-US relation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5(1): 63-93.

收稿日期 2017-06-16

作者简介 张辉,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话语分析与二语习得。罗一丽,博士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与话语分析。

(责任编辑 潘艳艳)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O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 New Era by WANG Shouren, p.1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f current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Having identifi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be given to the literary texts, the country's real needs and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greater efforts to be made to speed up the systematic work regarding academic research on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literary texts; China's real needs; Chinese perspective

A Critical Cognitive Analysis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 Discourse—A Perspective from Cognitive Grammar by ZHANG Hui & LUO Yili, p.4

The paper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conduct a critical cognitive analysis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 dis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Grammar proposed by Langacker.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clause organization with action chain in Cognitive Grammar, and make a judgmen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things or events described by intelligence analysts or writers in the use of grounding in intelligence discourse, which will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value in discourse analysis. We finally point out that linguistic theory, especiall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n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in intelligence analysis.

Key words: Cognitive Grammar; 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discourse analysis; action chain; grounding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Relations—From Saussure, Hjelmslev to Firth by WANG Wenbin & WU Juyan, p.32

In linguistics, some basic concepts which seem to be simple are not necessarily so clear to us about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developmental routes and connot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two concepts "syntagmatic relations" and "paradigmatic relations" in their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It probes into the track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thoughts hidden behind them: (1) Saussure puts forth the notions of syntagmatic relations and associative relations. (2) Hjelmslev uses the term of paradigmatic relations to replace associative relations. Meanwhile, Hjelmslev considers a text to be a dynamic "process" of syntagmatic relations, and a language system to be a static "system" of paradigmatic relations. (3) Firth brings forth the ideas of collocation and colligation on the syntagmatic axis. Furthermore, Firth's descriptive framework of structure and system, grounded on the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axe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o-Firthian school.

Key words: syntagmatic relations; paradigmatic relations; Saussure; Hjelmslev; Firth

The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into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by JIANG Fengchun & SI Bingyue, p.53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atus quo of information-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employing questionnaire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with 210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from a certain province in the northeast to be looked into. On the basis of three stages of teaching, that is, explo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the model of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teaching concepts, teaching organiz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ing monitoring and reflec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in order to prese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information-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ers investigated do not show satisfactory signs for their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and their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eds improving particularly.

Key word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utonomous teaching abilities

A Study of the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Mao Zedong's Long March Poems by LI Zhengshuan & REN Ting, p.71

Mao Zedong is not only a great leader, statesman,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and theorist, but also a great poet. He created many poems which are well-known and widely spread. Among his poems, some of them, such as "But we re-surmount it with big strides" "The hard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does not fear" "Thus a world of peace / Might share your warmth and cold" and so on, are known as the Long March poems which were created from February 1935 to February 1936. These poems are praised to have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the widest readership. And these poems are the vivid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ng March, so the spreading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poems is beneficial for publicizing Chinese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numerous translations of Mao Zedong's poems and the quality of these translations is not the same.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ao Zedong's Long March poems is necessary which can not only normalize the translation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preading of these poems.

Key words: Mao Zedong; Long March poems; translation strategy